

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决定:学历教育还是技能培训?

董长瑞,王秀燕,崔亚东

(山东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农民工就业稳定对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和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利用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考察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发现,高中(中职)及以上学历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初中以下学历教育对就业稳定性则表现为负向影响;对技能培训而言,专用性技能培训与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显著正相关,而通用性技能培训负向于就业稳定性。因此,加大农村地区教育投资力度,鼓励农民工参加技能培训尤其是专用性技能培训是当前提升就业稳定性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学历教育;技能培训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29X(2019)02-0084-10

一、引言

就业乃民生之本,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作为衡量就业质量极为重要的方面,就业稳定性已然成为劳动力市场关注的问题。然而,与城市劳动力相比,我国农民工就业极不稳定,劳动合同签订率低且期限短,城市间、职业间的低水平的横向流动频繁^[1]。根据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我国农民工数量近3亿,而与雇主或受雇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仅占35.1%。稳定的雇佣关系是劳动力人力资本(尤其是专用性人力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农民工人力资本原本匮乏,频繁的工作流动使其人力资本得不到有效积累。同时,也削减了受雇企业对其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动力。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工就业不稳定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性,对我国新型城镇化推进和经济发展质量提升都有极为不利的影响。提高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无论对于理论研究还是政策制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上世纪80年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国采用指令性国家分配式的用工制度,劳动力就业非常稳定。随着市场化改革和城镇化的推进,第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大量用工缺口,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向城市从事非农工作,灵活用工在多种行业成为发展趋势,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就业不稳定问题。尽管学者们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户籍制度、企业用工偏好、就业率为导向的就业政策等因素导致了农民工就业不稳定^[2-3],但传统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就业状况差异主要是由人力资本水平多寡造成的^[4-5]。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因素对农民工就业稳定的负向阻碍趋于弱化,人力资本对农民工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同时,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倒逼人力资本水平提升

收稿日期:2018-11-05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五大发展理念下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治理研究”(16ALJJ16);山东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下的就业技能结构研究”(17DJJJ08)。

作者简介:董长瑞,男,山东龙口人,博士,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民经济运行与调控。

和结构改变以适应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有何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以期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提高和人力资本提升制度完善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贡献在于:首先,拓展了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研究,与以往单独考察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就业效应不同,本文把二者统一纳入到同一分析框架下,考察其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其次,本文把技能培训细分为专用性和通用性技能培训,探索异质性培训对与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丰富了技能培训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理论研究。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劳动力流动和就业稳定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适度的劳动力流动是保持劳动力市场活力和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从经济学视角看,就业稳定性对应劳动力流动问题。传统研究职业流动的“迁移者-停驻者”(mover-stayer)模型认为,“迁移者”(mover)的一些内在特质(如发痒或者职业流动综合症等)使其倾向于不停地变换工作^[6]。职业搜寻理论则认为,由于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完全,劳动者为获取更高工资选择“以脚投票”的方式进行职业流动,流动净收益现值越高,劳动者越可能进行流动^[7-8]。从社会学视角看,劳动力就业稳定属于社会融入问题,社会网络、求职方式、文化因素等影响着就业稳定性^[9-10]。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有其自身特殊性,除了经济、社会因素外,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城乡二元结构等因素也影响着农民工就业流动和稳定^[11-12]。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的推进,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因素在农民工城市就业质量决定中作用发挥愈加关键。

就学历教育而言,在农村涌向城市的剩余劳动力群体中,受教育年限长的首先被筛选出来,最先成为进城从事非农工作的劳动者。同时,在城市拥有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在就业区位、行业类型、职业选择、工作时间等方面更具有自主权^[13]。在工作生涯中,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也往往具有更好的资源配置能力和信息辨析能力,善于把握工作机会和规划职业发展,相比学历教育较低的农民工,拥有较高的学历更容易成为专业技术人员或管理层^[14]。其次,受教育年限长的农民工,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良好的综合素质和较强的工作能力能够帮助其应对经济形势变化,即使在面临经济萧条时期,也易于避免被解雇的风险^[15]。第三,随着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企业加大了对新设备、新工艺的引进力度,这不仅加速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同时对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来“技工荒”等高素质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出现即为这一问题的反映,在此背景下,由于学历教育较高的农民工具备的学习能力较强,能够迅速满足新技术岗位所需,从而不易被受雇企业的资本替代。由此得出命题 1:正规教育学历越高,农民工就业稳定性越强。

一些研究表明,技能培训同样是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途径,可以提高劳动者工作技能和劳动生产率,进而对就业质量有明显的提升作用^[16-17]。近年来我国学术界非常关注农民工技能培训与非农就业之间的关系问题^[18-19],相关研究也呈现出从理念到具体、从总论到细分的演进趋势。然而,由于缺乏对培训种类的细分,现有研究并没有取得一致认识。有学者认为技能培训能够弥补农民工正规学历教育的不足,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就业能力,对农民工从事非农就业具有重要的作用^[20]。比如,技能培训能够有效促使劳动力在职业发展上向上流动,提高就业稳定性^[21]。甚至有学者认为,与正规学历教育相比,技能培训的工资回报率更高^[22]。而王海港等^[23]通过考察珠三角农村地区实施的职业技能培训效果,发现培训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随着对技能培训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根据技能培训的付费对象进行分类,考察不同类型的培训对农民工就业的效果差异。研究表明,企业培训效果最好,个人培训次之,政府提供的培训效果不显著。有研究认为,政府提供的培训更接近于劳动者求职前的引导性培训,并不能有效提升劳动者的工作技能^[24-25]。个人培

训虽然根据自己需求参加,然而与培训结束后的求职岗位不一定严格匹配^[26],与个人培训、政府培训不同,企业培训针对特定的工作岗位需求提供培训内容,针对性、匹配性强,具有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特征,从而提高了员工主动离职的机会成本,有助于劳动力的就业稳定^[27]。

Becker^[28]根据培训所形成的技能与工作岗位的关系对技能培训进行分类,把与工作岗位相关的技能培训定义为专用性培训,与劳动力工作岗位无关的一般性知识或技能的培训则称为通用性培训。一般而言,通用性培训的内容一般具有外部性特征,一方面增加了受训员工的人力资本水平,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员工的跳槽资本^[29]。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等就业条件的确定是企业 and 员工双方博弈的结果,一旦其他竞争企业许诺该员工更高的收益,培训员工很容易被对手企业挖走。而专用性培训则是针对特定的工作岗位需要进行的,属于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能够提高培训企业的生产力,对其他企业而言则毫无意义。经过专用性培训,受训员工专用性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得到提升,但是在培训企业外却没有市场需求,所以,如果离开培训企业,则意味着在该企业积累的专用性人力资本变为沉没成本。同时,随着专用性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企业将给受训员工提供更多的工资或职位晋升机会,该员工对个人工作能力和未来工作收益会有一个好的预期,所以专用性人力资本促使受训员工与特定工作岗位产生锁定效应^[30],增强了员工对受雇企业的忠诚度,有利于就业稳定性的提升。由此,提出命题 2:专用性技能培训能够提升农民工就业稳定性,以及命题 3:通用性技能培训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有抑制作用。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介绍

文章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2008 年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Rural Urban Migration in China,以下简称 RUMIC2008),RUMIC2008 属于中国收入分配调查(CHIP)的一个子样本。调查由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学者发起,并在国家统计局和德国劳动研究所的支持协助下完成。该调查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较为集中的城市进行,涉及我国 9 个省份 15 个城市,包括珠三角地区:广东省的广州市、深圳市和东莞市;长三角地区:上海市、江苏省的南京市和无锡市、浙江省的杭州市和宁波市、安徽省的合肥市;以及内陆 6 个城市:湖北省的武汉市、安徽省的蚌埠市、河南省的郑州市和洛阳市、重庆市、四川省的成都市。数据搜集了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婚姻、收入、就业以及职业技能培训等信息,为本文研究提供很好的数据支撑。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参照李培林和李炜^[31]对农民工概念的界定,在数据处理过程中,选取 16~64 岁在城市以雇员身份从事工资性工作的农村户籍人员,在此基础上,剔除了受教育年限、培训及工资收入等重要相关变量存在信息缺失的样本,最终获得有效样本 4 888 个。

(二)主要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农民工就业稳定性

学术界对就业稳定性测度尚没有形成统一认识。宏观层面一般用临时解雇员工的比例和停工的数量测度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稳定情况;微观层面主要针对劳动力个体,一般用工作任期的长短、劳动合同长短、一定时期内更换工作的频率来衡量。

本文从微观视角考察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结合数据情况,根据劳动合同的长短定义就业是否稳定,具体而言,当前工作性质中回答“固定工”和“长期合同工”的农民工定义为就业稳定,赋值为 1,“短期合同工”“无合同的临时工”“打零工”和“其他”定义为就业不稳定,赋值为 0。

2.解释变量:正规学历和技能培训

学历教育:根据数据库中受访农民工的受教育年限划分了小学、初中、高中(中职)、大学及以上四个层次。

技能培训:在 RUMIC2008 调查问卷中,不仅有农民工是否接受过培训的调查,而且还针对培训的具体内容、培训期限的长度、培训费用以及费用承担方都有详细的问询。根据前文分析,不同类型的技能培训对就业稳定性可能存在不同的影响机制和效果,结合数据情况,本文根据技能培训的性质进行了分类。具体而言,与特定工作相关的技能培训视为专用性培训,与工作无关的一般性知识培训定义为通用性培训。

3.控制变量

除了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外,还有一些变量可能影响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本文把它们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回归模型。比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健康水平、社会资本、受雇单位所属的行业、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大小以及工作所在地区;另外,有研究认为,农民工工资收入也影响就业稳定性,本文把工资收入也加入了回归模型。

(三)描述性统计

表 1 给出了样本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学历状况、技能培训、职业类型等信息。

表 1 主要变量的定义、赋值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就业稳定性	就业稳定(固定工或签订长期劳动合同)=1;就业不稳定(短期合同工、无合同的临时工、打零工或其他)=0	0.5219	0.4996
学历状况	小学=1;其他=0	0.1049	0.3065
	初中=1;其他=0	0.5546	0.4971
	高中(职业中专或技校)=1,其他=0	0.2919	0.4547
	大学及以上=1;其他=0	0.0485	0.2148
技能培训	有过培训经历=1;否=0	0.2928	0.4551
	有过农业生产培训经历=1;否=0	0.0094	0.0966
	有过企业内部的非农业培训经历=1;否=0	0.2066	0.4049
	有过政府、社区等提供的非农业培训经历=1;否=0	0.0782	0.2684
	与工作相关的技能培训=1;否则=0	0.2582	0.4377
	与工作无关的一般性培训=1;否=0	0.0338	0.1806
性别	男=1;女=0	0.6078	0.4883
年龄	2008 减去出生年份	29.6917	9.9097
婚姻状况	已婚(初婚、再婚)=1;其他(同居、离异、丧偶、未婚)=0	0.5286	0.4992
健康状况	非常不好=1;不好=2;一般=3;好=4;非常好=5	4.2502	0.7276
工资收入	ln(当前主要工作平均每月得到的总收入+1)	7.1506	0.5052
社会资本	对“最近 12 个月内给你帮过忙的人数”进行 1%缩尾处理	2.7707	3.4604
所属行业	制造业=1;其他=0	0.2477	0.4317
	建筑业=1;其他=0	0.1287	0.3349
	批发零售业=1;其他=0	0.1586	0.3653
	餐饮业=1;其他=0	0.1884	0.3911
	其他行业:是=1;否=0	0.2766	0.4474
企业性质	国有企事业单位:是=1;否=0	0.1285	0.3347
	私营企业:是=1;否=0	0.5227	0.4995
	个体工商户:是=1;否=0	0.2293	0.4204
	外资、合资企业:是=1;否=0	0.0696	0.2544
	集体企业:是=1;否=0	0.0479	0.2135
	其他所有制:是=1;否=0	0.0020	0.0452
企业规模	员工人数在 50 人以上:是=1;否=0	0.4914	0.5000
	员工人数小于 50 人:是=1;否=0	0.5086	0.5000
所在地区	珠三角地区:是=1;否=0	0.2279	0.4195
	长三角地区:是=1;否=0	0.4106	0.4920
	内陆地区:是=1;否=0	0.3615	0.4805

从表 1 统计结果来看,农民工就业稳定性较差,所有样本中近一半的农民工处于就业不稳定状态;人力资本变量显示,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较低,初中及以下学历占到 65.95%的比例;技能培训的统计结果也表明农民工技能培训的不足,仅有 29.28%的农民工有过培训经历。其中,有 1 010 人参加的是由企业内部提供的培训,占全部样本的 20.66%,382 人接受的培训是由有政府、社区等外部机构提供,占全部分析样本的 7.82%。在最近一次接受的培训中,有 1 262 人参加了与特定工作相关的技能培训,165 人参加了与工作无关的一般性培训,分别占全部分析样本的 25.82%和 3.38%。

人口特征变量显示,男性占比 60.81%;已婚占到一半以上,为 52.92%;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健康得分平均为 4.25,表明农民工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农民工的就业特征来看,农民工多在建筑业、制造业、餐饮业、批发零售业就业;受雇企业的所有制类型中,私营企业占比为 52.31%,个体工商户为 22.96%,其他所有制类型占比较小,说明农民工大多受雇于体制外的就业单位。

(四) 实证检验

1. 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的 Probit 模型计量检验

在本文中,被解释变量就业稳定性是二元 0、1 变量。为了检验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首先使用 Probit 模型估计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设定回归模型如下:

$$stable = \beta_0 + \beta_1 \times edu + \beta_2 \times train + \sum \beta_i \times X_i + \varepsilon_i \tag{1}$$

(1)式中,*stable* 表示农民工就业稳定性, β_0 代表模型的截距项,*edu* 代表农民工学历教育情况,*train* 代表技能培训状况, X_i 代表一系列可能影响就业稳定性的控制变量,包括农民工人口学特征和受雇企业特征, ε_i 表示模型的随机误差项, β_1 、 β_2 分别为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的估计系数, β_i 为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为了使计量回归系数具有解释意义,本文输出的均为 Probit 模型的边际效应。回归结果见表 2。

根据表 1 回归结果可知,随着农民工学历教育水平提升,就业稳定性越强。首先,以小学学历为参照,初中学历的回归系数不显著,现实境况也是如此,初中毕业不再继续接受高一层教育、直接以工作为目标的学生往往在整个初中阶段都不再努力,初中教师对这一类学生的管理也放松了要求,致使初中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比小学毕业生没有实质性的改善。高中(职业中专、技校)学历、大学以上学历的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显著提高,表明学历教育提高了农民工的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拥有高中(职业中专、技校)学历或者大学以上学历的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优势非常明显,获得稳定就业的机会大大高于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农民工^[32]。其次,中等职业学校与一些正规企业(如外资或合资企业,甚至一些国有企业)进行校企合作,按照企业要求培养专业技术工人,提高了职业中专、技校毕业生的专业技能,促进了稳定就业^[33];第三,大学以上学历显著正向于农民工就业稳定性,表明大学学历以上的农民工不仅易于获取正规就业的机会,他们在接受新知识、新技能、应对经济形势变幻以及配置各种信息资源方面更具有绝对的优势,成为单位管理层、专业技术人员的概率更大,大大提升了就业稳定性,命题 1 得到验证。

根据前文分析,不同类型的培训与农民工就业稳定性之间具有不同的影响机制。从表 2 回归结果看,总的来说,有过培训经历的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增强了 6.8%。而回归模型(2)、(3)、(4)表明,专用性培训(与工作内容相关的技能培训)显著提高了 8%的就业稳定性,从回归系数大小来看,专用性培训发挥的作用超过了高中(中职)学历;通用性培训(与工作无关的一般培训)与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显著负相关,但是系数不显著;农业生产培训与农民工非农就业不相关,因此与就业稳定性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计量结果与前文分析基本一致。

表 2 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的计量检验结果

变 量	(1)	(2)	(3)	(4)
接受过培训	0.0676 *** (0.0154)			
专用性培训		0.0801 *** (0.0159)		
通用性培训			-0.0469 (0.0376)	
农业生产培训				0.0839 (0.0707)
大学及以上	0.1033 *** (0.0389)	0.1038 *** (0.0389)	0.1087 *** (0.0391)	0.1073 *** (0.0391)
高中(中职)	0.0612 ** (0.0262)	0.0606 ** (0.0262)	0.0726 *** (0.0263)	0.0714 *** (0.0262)
初中	0.0222 (0.0237)	0.0220 (0.0237)	0.0257 (0.0238)	0.0254 (0.0238)
社会资本	-0.0025 (0.0020)	-0.0024 (0.0020)	-0.0016 (0.0020)	-0.0018 (0.0020)
性别	0.0415 *** (0.0146)	0.0418 *** (0.0146)	0.0474 *** (0.0146)	0.0465 *** (0.0146)
年龄	-0.0018 * (0.0010)	-0.0018 * (0.0010)	-0.0023 ** (0.0010)	-0.0023 ** (0.0010)
婚姻状况	0.0782 *** (0.0184)	0.0777 *** (0.0184)	0.0800 *** (0.0185)	0.0795 *** (0.0185)
健康状况	0.0430 *** (0.0093)	0.0429 *** (0.0093)	0.0410 *** (0.0093)	0.0414 *** (0.0093)
月工资收入	0.0766 *** (0.0210)	0.0760 *** (0.0208)	0.0807 *** (0.0217)	0.0804 *** (0.0217)
制造业	0.0597 *** (0.0209)	0.0610 *** (0.0209)	0.0468 ** (0.0208)	0.0477 ** (0.0208)
建筑业	-0.2379 *** (0.0238)	-0.2355 *** (0.0238)	-0.2499 *** (0.0236)	-0.2495 *** (0.0236)
批发零售业	-0.0295 (0.0213)	-0.0281 (0.0213)	-0.0360 * (0.0213)	-0.0366 * (0.0213)
餐饮业	-0.0293 (0.0202)	-0.0287 (0.0202)	-0.0313 (0.0202)	-0.0317 (0.0202)
国有企事业单位	0.1475 (0.1410)	0.1401 (0.1382)	0.1373 (0.1375)	0.1416 (0.1391)
私营企业	0.1246 (0.1401)	0.1183 (0.1372)	0.1165 (0.1365)	0.1196 (0.1381)
个体工商户	0.0047 (0.1407)	-0.0004 (0.1378)	-0.0087 (0.1371)	-0.0056 (0.1387)
外资(合资)企业	0.2961 ** (0.1430)	0.2894 ** (0.1401)	0.2838 ** (0.1394)	0.2876 ** (0.1410)
集体企业	0.2074 (0.1432)	0.2006 (0.1404)	0.1965 (0.1397)	0.2001 (0.1412)
员工人数在 50 人以上企业	0.0855 *** (0.0157)	0.0843 *** (0.0157)	0.0912 *** (0.0156)	0.0908 *** (0.0156)
地区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4888	4888	4888	4888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其他控制变量方面,已婚、身体健康的男性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更强,社会资本对就业稳定性不显著,工资水平有利于就业稳定。从受雇单位特征来看,私营企业、个体企业、以及集体所有制企业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不显著,而受雇于外资企业的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显著提高,这与政府对外资企业的监管力度更强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国有企事业部门并没有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说明在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背景下,农民工更多地在缺乏政府监管的非正规部门就业,即使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取得工作岗位,也多数是临时工或者短期就业,不能成为所谓的“编内成员”^[34]。从农民工从事的行业看,以其他行业为参照,从事建筑和餐饮行业的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最差,制造业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显著增强^[35]。另外,相比于小于 50 人规模的企业,受雇于 50 人以上规模企业的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更强。

2.技能培训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的 PSM 方法再检验

对于农民工来说,学历教育在其进城务工之前已经完成,即初始人力资本积累已经确定。在工作中只能通过培训或者“干中学”的方式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在评估培训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时,一般情况下,估计培训的数据并非抽样调查数据,即农民工是否接受培训不是随机分布的,直接进行 OLS 回归会因样本选择偏差的存在而产生估计偏误。因此,本文使用 Rosenbaum 和 Rubin^[36]提出的倾向得分匹配法来纠正干预效应估计的偏差,主要思想是在处理组和控制组两组样本可观测变量尽可能相似的前提下,比较其估计结果的差异,其中,倾向得分即在样本可观测影响因素给定时接受干预的条件概率,表达式为:

$$P(X) = \Pr\{D = 1 \mid X\} = E\{D \mid X\} \tag{2}$$

其中, D 为是否接受干预的 0、1 变量, X 为表示一系列可观测变量组成的多维向量, P 是在 X 多维向量给定前提下样本接受干预的条件概率,是一个一维变量。若干干预是随机分布的,那么,匹配倾向得分后,通过比较估计结果差异即可得到培训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平均处理效应 (Average Effect of Treatment on the Treated, ATT),表达式为:

$$\begin{aligned} ATT &= E(Y_{1i} - Y_{0i} \mid D_i = 1) \\ &= E\{E\{Y_{1i} - Y_{0i} \mid D_i = 1, P(X)\}\} \\ &= E\{E\{Y_{1i} \mid D_i = 1, P(X)\} - E\{Y_{0i} \mid D_i = 0, P(X)\} \mid D_i = 1\} \end{aligned} \tag{3}$$

(3)式中, Y_{0i} 为实验组假设没有接受培训时被解释变量的取值,即反事实情形下的潜在效果。本文采用标准的概率模型来估计农民工培训的倾向得分。由于是连续变量,进行精确匹配比较困难,所以,本文采取多种匹配方法进行匹配,以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回归结果见表 3。

表 3 技能培训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平均处理效应的估计结果

A 培训	匹配方法	处理组	控制组	ATT	S.E.	T-stat
	核匹配	0.5933	0.5229	0.0704 ***	0.0166	4.2304
	近邻匹配	0.5933	0.5010	0.0922 ***	0.0226	4.0892
	卡尺匹配	0.5933	0.4942	0.0991 ***	0.0242	4.0967
B 专用性培训	匹配方法	处理组	控制组	ATT	S.E.	T-stat
	核匹配	0.6109	0.5286	0.0824 ***	0.0170	4.8556
	近邻匹配	0.6109	0.5326	0.0783 ***	0.0229	4.4164
	卡尺匹配	0.6109	0.4925	0.1184 ***	0.0274	4.3220
C 通用性培训	匹配方法	处理组	控制组	ATT	S.E.	T-stat
	核匹配	0.4540	0.5148	-0.0609	0.0398	-1.5281
	近邻匹配	0.4540	0.5225	-0.0685	0.0560	-1.2228
	卡尺匹配	0.4540	0.5239	-0.0698	0.2118	-0.3396

表 3 中 A、B、C 子表分别为参加过培训、专用性培训、通用性培训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估计结果。从子表 A 的回归结果看,采用三种匹配方法,对两组样本中影响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特征变量完成匹配后,参加

过培训的比未参加过培训的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显著提高了 7% 以上。具体分培训类型来看,子表 B 的回归结果表明,专用性培训的效果更为显著,参加专用性培训的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提高了 7.8% 以上;而子表 C 中通用性培训对就业稳定性具有抑制作用,尽管在统计上仍不显著。与前文 Probit 模型回归系数结果相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样本的选择性偏差后,农民工培训的效果依旧显著,其中,专用性培训对就业稳定性的促进作用更大,通用性培训的估计系数变化不大。

专用性培训提高了农民工专用性人力资本水平和工作技能,企业也愿意给受训农民工提供较长期限的劳动合同和更高的工资待遇,而农民工对未来工作的理性预期促进其对工作岗位的认同,提升了对企业的忠诚度,降低了跳槽的意愿。这个结果很好地回应了文章第二部分给出的理论推断,即专用性技能培训提升了农民工就业稳定性,通用性技能培训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有抑制作用,命题 2 和命题 3 得到验证。

3. 技能培训的稳健性检验

表 4 异质性培训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的稳健性分析

A 专用性培训	匹配方法	处理组	控制组	ATT	S.E.	T-stat
	核匹配	0.6347	0.5317	0.1030 ***	0.0179	5.7502
	近邻匹配	0.6347	0.5520	0.0827 ***	0.0248	3.3296
	卡尺匹配	0.6347	0.4966	0.1381 ***	0.0337	4.0929
B 通用性培训	匹配方法	处理组	控制组	ATT	S.E.	T-stat
	核匹配	0.4738	0.5224	-0.0486 *	0.0270	-1.8014
	近邻匹配	0.4738	0.5263	-0.0524	0.0376	-1.3928
	卡尺匹配	0.4738	0.5233	-0.0494	0.0860	-0.5751

鉴于有学者根据技能培训的提供方是否为企业,对技能培训进行分类,即把由特定企业组织的培训称为专用性培训,将其他非企业组织提供的培训定义为通用性培训^[37],因此,结合数据情况,本文对农民工培训进行了重新分类,把由企业提供的培训定为专用性培训,而把政府、社区等其他社会组织提供的培训称为通用性培训,由此,使用平均处理效应模型进一步考察异质性技能培训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以检验前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表 4 的回归结果显示,虽然农民工技能培训的分类标准不同,但是与前文回归结果一致,专用性培训显著提升了农民工就业稳定性,而通用性培训的影响同样是负向的,说明前文的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四、结论和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农民工个体人力资本视角,分析探讨了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与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机制,并使用 2008 年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RUMIC2008)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

1. 学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以小学学历为参照,初中及以下学历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表现为负向影响,而受过高中(中职)教育的农民工提升明显,大学以上学历的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更是提升了 8% 以上,表明学历教育提升了农民工的综合素质和劳动生产率,农民工自身应对经济风险、经济转型的能力增强,受雇企业也倾向于向高学历农民工提供较长期限的劳动合同。
2. 技能培训整体上提升了农民工就业稳定,具体分培训类型而言,专用性培训提升农民工就业稳定作用明显,而通用性培训与就业稳定性呈负相关关系;根据技能培训是否由企业提供重新定义专用性和通用性培训,进而对技能培训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前文得出的结论是稳健的。

(二) 政策建议

1. 要继续加大对农村地区教育的投资力度。提升九年义务教育质量,改变以往教育资源分配城市偏向的局面,使更多的教育资源、师资力量向农村倾斜,提升基础教育的公平性。鼓励农村更多的孩子继续接受高中、中职教育,提升农村居民的整体受教育水平。

2. 积极开展农民工技能培训,使之成为正规学历教育的有益补充。根据各地区产业发展要求,有针对性为农民工提供实用性的技能培训,尤其是专用性技能培训,切实提升农民工的技能水平和就业能力,提高就业质量,促进就业的稳定。

3. 鉴于企业在技能培训方面的优势,实行政府和企业合作举办农民工培训,或者以政府购买企业培训服务的形式向农民工提供技能培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操性,提高农民工在城市非农就业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白南生,李靖.农民工就业流动性研究[J].管理世界,2008(7):70-76.

[2] APPLETON S, KNIGHT J, SONG L, et al. Labor retrenchment in China: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2, 13(2): 252-275.

[3] 周亚平.城市化与容忍度——域外争鸣与本土启示[J].人文地理, 2013, 28(3): 15-19.

[4] 姚先国,俞玲.农民工职业分层与人力资本约束[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36(5): 16-22.

[5] 李萍,谌新民.人力资本投资、就业稳定性与产业转型升级——基于东莞市的经验数据[J].学术研究, 2012(9): 80-86.

[6] GUITTON H, BLUMEN L, KOGAN M. The industrial mobility of labor as a probability process [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1955.

[7] SJAASTA L A. The costs and returns of human migration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2, 70(5): 80-93.

[8] 田明.进城农民工的高流动性及其解释[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5): 69-80.

[9] BANERJEE B. The role of the informal sector in the migration process: A test of probabilistic migration models and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for India [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83, 35(3): 399-422.

[10] 田北海,雷华,余洪毅,等.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孰重孰轻:对农民工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的再探讨——基于地位结构观与网络结构观的综合视角[J].中国农村观察, 2013(1): 34-47.

[11] 张锦华,沈亚芳.家庭人力资本对农村家庭职业流动的影响——对苏中典型农村社区的考察[J].中国农村经济, 2012(4): 26-35.

[12] 朱德云,孙成芳.农民工市民化背景下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文献综述[J].山东财经大学学报, 2017, 29(6): 106-114.

[13] 严善平.人力资本、制度与工资差别——对大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 2007(6): 4-13.

[14] 符平,唐有财,江立华.农民工的职业分割与向上流动[J].中国人口科学, 2012(6): 75-82.

[15] 蔡昉.中国二元经济与劳动力配置的跨世纪调整——制度、结构与政治经济学的考察[J].浙江社会科学, 2000(5): 19-23.

[16] MINCER J. Experience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earnings [J]. 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2001, 1(4): 343-361.

[17] WOOLDRIDGE J M.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ross section and panel data [M].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2008.

[18] 宁光杰,尹迪.自选择、培训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提高[J].中国农村经济, 2012(10): 49-57.

[19] 阳玉香,莫旋.政府培训能增加流动人口的收入吗?——基于 Blinder-Oaxaca 分解的实证研究[J].人口与经济, 2017(4): 119-126.

[20] 展进涛,黄宏伟.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及其工资水平的决定:正规教育还是技能培训?——基于江苏金湖农户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 2016(2): 55-67.

[21] 王超恩,符平.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职业分层与代际差异视角的考察[J].人口与经济, 2013(5): 89-97.

[22] 赵海.教育和培训哪个更重要——对我国农民工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 2013(1): 40-45.

[23] 王海港,黄少安,李琴,等.职业技能培训对农村居民非农收入的影响[J].经济研究, 2009(9): 128-139.

[24] KAMBOUROV G,MANOVSKII I,PLESCA M>Returns to government sponsored training[G].Society for Economic Dynamics,2005.

[25] 翁杰,郭天航.中国农村转移劳动力需要什么样的政府培训? ——基于培训效果的视角[J].中国软科学,2014(4):73-82.

[26] 王秀芝,孙妍.转移劳动力培训效果研究——基于个人培训、企业培训与政府培训的比较[J].软科学,2016,30(1):100-104.

[27] 孟凡强,吴江.我国就业稳定性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J].人口与经济,2013(5):79-88.

[28] BECKER G S.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A theoretical analysi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62,70(5):9-49.

[29] HASHIMOTO M.Firm-specific human capital as a shared invest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1,71(3):475-482.

[30] 湛晓舟,贾君.企业在职培训能否提升就业稳定性——基于广东南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学术研究,2016(12):101-109.

[31] 李培林,李炜.近年来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态度[J].中国社会科学,2010(1):119-131.

[32] 王建.正规教育与技能培训:何种人力资本更有利于农民工正规就业? [J].中国农村观察,2017(1):113-126.

[33] 刘万霞.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基于对全国农民工调查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13(5):64-75.

[34] 李强,唐壮.城市农民工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J].社会学研究,2002(6):13-25.

[35] 曾江辉,陆佳萍,王耀延.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5(14):97-99.

[36] ROSENBAUM P,RUBIN D B.The central role of the propensity score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 for causal effects[J].Biometrika,1983,70(1):41-55.

[37] ZWEIMULLER J,WINTEREBMER R.Firm-specific training:Consequences for job mobility[J].IEW Working Papers,2000,56(2):343-350.

Determinant Factors on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Stability: Academic Education or Skill Training?

DONG Changrui,WANG Xiuyan,CUI Yadong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Employment stability of migrant workers is greatly significant for improving new urbanization level and promoting the urba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academic education and skill training on the employment stability of migrant workers by adopting the data of China urban and rural labor mobility survey. It is found that high school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education or above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employment stability of migrant workers while education below junior high school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ir employment stability. In terms of skill training, specific skill training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employment stability of migrant workers while general skill training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employment stability. Therefore, increasing the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and encouraging migrant workers to participate in skill training, especially specialized skill training, are important ways to improve employment stability.

Key words:migrant worker; employment stability; academic education; skill training

(责任编辑 赵 甜)